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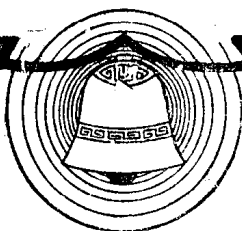
國文精選叢書

明清散文選

葉楚傖
劉延陵
胡倫清

主編
編註
校訂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京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滬四版

明清散文選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三元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主編者	葉楚傖
編註者	劉延陵
校訂者	胡倫清
發行所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684)

序 言

從東漢末葉到清朝滅亡的這一千七百多年的中國散文史，可以概括地劃分做兩個時期，就是從漢末到初唐的以綽麗著稱的八代文時期。和從韓愈到清末的『古文』的時期。被司馬遷首先使用的『古文』這名詞，到了韓愈的時候，是專指宗主三代、秦漢，而和八代文對立的那一種比較簡樸的文體了。自從韓先生肇起了這幅大旗，以起『八代之衰』後，牠從此就在文壇的飛舞着，支配着，一直到最近十幾年之前才被人卸落下的。在這個延展到一千一百年的中國做散文的人是沒有誰敢不站在牠的下面，也沒有誰不以站在這裏爲榮的。所以中國散文的歷史，這一個長時期都是『古文』期。

可是這期間，『古文』的内部卻曾有過若干次的波瀾與變化。這大半是發生於明、清兩代；因爲唐朝末葉和宋朝元朝的許多作者，雖然風格各異，但大都宗主韓愈而且不會樹立過森嚴的壁壘互相對抗，惟有明朝，卻曾有好幾個派系此起彼仆地鬧了整整的二百多年；清朝也有一個很長的期間拋棄了單純的『古文』名目，另外樹起一個番號以代表那期間的散文。所以講起中國近

代『古文』的發達史來，明、清兩代的值得注意，是不下於宋、元的。

明朝的散文的演變分好幾個階段。

首先是太祖開國的時期。這時候最著名的作家有宋濂、劉基、王禕、方孝孺等人。濂的敷腴闳肆，基的俊奇多姿，禕的平易和緩，孝孺的縱橫豪放。這一種近於『陽剛』的風調，與其說是受了明朝開國時蓬勃的朝氣之感染，還不如認為各個作家個人性格的表現與所受教育的結果。

其次是成祖以後的太平時期。從成祖永樂年間經過仁宗、宣宗、英宗三代，在明朝是一個比較安樂的時候。這一種安樂的氣息本來就很容易傳給文學，造成一種和平典雅的風格。加以這時中央政府裏又有三位內閣大臣，做起文章來全都是歐陽修一派的雍容紆徐的調兒，所以安舒的作風就更有有力地被推揚開來。他們就是被後人稱為『三楊』的楊寓、楊榮、楊溥。他們這種文體，因為創始於『金馬玉堂』『丹陛紫垣』之間，所以後人又稱做『臺閣體』。

臺閣體的好處是從容安閒，但牠的末流卻變成膚廓空虛。本來明朝從太祖以『八股文』取士以後，中國的文人爲圖富貴功名起見，已經天天在哼那一種有腔調而少意義的文章，現在大家

寫起『古文』來又都是這麼有氣乏力澹泊無味，於是依照『物極必反』的道理，就自然激起一派對抗的勢力來。這一派崛起於孝宗弘治、武宗正德年間。他們主張雄邁生硬以藥臺閣體的萎靡平庸，奉唐宋以前的『古文』大家來壓倒疏淡平易的宋人。他們的口號是『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他們的中軍是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七人，就是所謂『前七子』。雖然他們的作風一新當時的耳目，而他們卻是過分著意於文格的雕飾而忽略了牠所表現的情意，所以論他們的態度，根本就認錯了文學的功用；論他們的作品，最好也不過是些假造的漢秦鐘。

於是到了世宗嘉靖年間，就有四位有名的文人發出反抗的呼聲。在前的是王慎中和唐順之，稍後的是茅坤和歸有光。他們都提倡做唐宋人的文章。雖然摹倣唐宋和剽竊秦漢是同樣地仿古，但唐宋人的文章既然和明朝的口語比較相近，他們的主張也就自然是比較地合理。

這許多人中，最有成績的是歸有光：他以平易的文字寫家庭社會間的瑣事，神態生動，風韻悠遠，學歐陽而能化，有三楊的明白而不同其空虛，雖然他的文學作品也祇是些單篇的散文，但論他的見解和作風，卻不能不算高人一等的。所以後來黃宗羲還引別人的話稱他『爲明文第一』哩。

當這四位的主張得到一部分的文人的同情之時，復古派的氣燄依然未熄，所以又有一個團體叫做『後七子』的樹立起來，表示要追躡『前七子』的高風。後七子就是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第一位和前七子的魁首同樣姓李，不能不說是一件有趣的巧合。他們的主張和前七子完全是一鼻孔出氣；他們的『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的標語，和前七子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旨趣完全一致。但倡導的人還從文章的氣魄精神上用功，而後來的這班徒弟卻專在形貌上雕飾，割裂字句，硬填生砌，製成的又是紙糊的商鼎周彝了。

這兩派對峙了四五十年。到了神宗萬曆的中葉，又有一枝生力軍起來和前後七子對壘。那就是稱為公安派的公安地方的袁宗道、宏道、中道兄弟三人。他們以抒寫自我的主張來抵制對方面仿古的呼號，以清新輕俊的作品與後七子的板重相抗衡。他們主張屏絕摹擬，由作者各以自己獨特的風格抒情達意。這本是一種最正當的主張，但因那時候大家都蹈故襲常，習非成是，所以牠終未能感化反對派因襲的見解——這些人是堅信不摹仿秦漢就得效法唐宋的。加以三袁自己又有一個弱點給反對者做攻擊的藉口：就是他們的作品，除去很少數的篇章以外，都缺乏深摯的情感，而且他們祇知道不當摹仿，但他們除去有一點清新的氣息而外，卻不會能夠創造更具體的新

的好的風格，以抗衡對方面由摹擬得來的技巧；所以他們的作品有許多像是隨便寫成的。於是反對者就把牢這一點以指證他們的淺薄。不過，撰作與主張終究是兩件事；三袁的作品雖不算好，但他們的主張，卻是優越的，優越於剽竊秦漢的前後七子，也優越於步武唐宋的王、唐、茅、歸。

同時和公安派的清俊表示異議的，有竟陵人鍾惺、譚元春，又故意走向幽深孤峭的一路。他們被稱為竟陵派。他們在不摹擬秦漢的這消極的主張上，雖和公安派立於同一戰線，但他們的積極的主張是比較地不自然的，影響也當然就比較地小了。

從公安、竟陵到明朝亡國的這五十年就是文學史上所謂『明末』這期間，除去上述的二派和正統派裏幾個比較著名的作家如錢謙益、艾南英、張溥、陳子龍幾位外，別的就是現代所謂『晚明小品文』的許多不甚著名的作者了。這後面的一羣，對於文學的見解比較和公安派相近，所以他們的作品都有逍遙瀟脫的風調；但因他們也具有公安派的缺點，所以也就多美句而少完篇。

在學術方面以考據和駢文見稱的清朝一代的『古文』論質論量雖都不弱於明朝，而講起派別的起仆來，是沒有那樣曲折可觀的。

清朝的『古文』在開國初年和以後康熙、乾隆、嘉慶三朝最是興盛；因為起初，有大批明朝遺留下來的文人學者；後來又因為籠絡漢族起見，開博學鴻詞科和編纂許多大部的書籍，在學藝上確有蓬勃氣象。

清初有一批不以文人出名而文章亦復可觀的學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稱爲『國初三老』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王與黃的文章俱能自抒機軸，不守門戶。顧則有比他倆更好的文學作品與更徹底的見解；他在名著日知錄裏指斥文人摹擬的話，是很有價值的。

同時最以文章著名的又有侯朝宗、魏禧、汪琬組成的所謂『國初三家』。侯得力於史記，浮誇閎肆而善於敘事；魏學左傳與蘇洵，縱橫雄健而精於說理；汪步武、歐、曾，疏淡紆迴而亦長於傳記。汪的文刺激性不及侯、魏，但從容不迫雍容爾雅的態度，則上接唐、歸，下啓桐城，在以後的清代古文史上有很大的影響，所以他的地位，是不可忽略的。

同時著名的文人，還有金人瑞、王猷定、邵長蘅、姜宸英、朱彝尊、彭士望等。中間最值得注意的是金人瑞：他的文筆迴環往復，縱橫疏暢，無不達之意，不盡之情，雖有時排比過多，枝節橫生，但就大體而言，掃除依傍抒寫自我的見解，是和公安派一脈相承，卓然自成一家的。

錢謙益、嘉慶兩朝的散文家以鄭燮、章學誠、袁枚最堪注意。鄭敢在大家都做『古文』的時候，做白話式的文章，那種大膽的嘗試，是值得欽佩的。章把歷來文人仿古摹今的習氣，駁擊得體無完膚，提出『清真』二字做作文標準，這種精神和見解，也同樣地值得敬服。他說：『古人文成，法立，如語言之有起止，啼笑之有收縱，自然之理，豈有一定式哉？文而有式，則面目雷同，性靈銅蔽，而古人立言之旨晦矣。』袁論詩論文，都主張屏絕依傍，自寫『性靈』。他在隨園詩話和許多散文裏對這方面的議論固然警闢；他的作品也能融貫百家，自成一種可愛的風格。總之，這三位對於文學的見解，也可說是公安派。

但清朝的散文並不是一直沿這些開明的文人所經的路線展開的；因為，上文說過，『國初三家』中汪琬，已先決定了清朝古文『正統』的歷史了。汪是屬於歐陽修、曾鞏那一派的。稍後有方苞，方之後有劉大櫚，劉之後有姚鼐，也都循他的蹤跡走去。因為這後面的三位都是安徽桐城人，於是姚鼐作為這個系統的大師的所謂『桐城派』就成立了。論到這一派的作風，大概不外乎『味淡聲希，整潔從容』。優點在辭語平易近人，缺點在故意做出一唱三歎吞吐不盡的神氣，不敢有一點兒大聲壯語，豪氣熱情；牠和已往的古文宗派雖都不盡同，但實際上是以歐、曾為始祖，沿明朝的

三楊、唐歸和清朝的汪琬這個世系產生出來的。姚鼐的及門和私淑弟子很多，在姚氏負盛名之後約一世紀中，古文的壇佔算是由他主盟了。

桐城派的末流，也和明朝臺閣體的後裔相似，變得枯虛無味；因此不久就有兩個異派產生。一個是於遵守桐城的義法以外，更帶點縱橫矯厲氣息的，以武進張惠言、惲敬做宗師的所謂陽湖派；一個是學戰國策的縱橫，韓非的廉悍，以地理掌故世情民隱做質實的龔自珍和魏源。龔比魏更有名。龔氏策畫考據的文章，對於一般讀者，雖屬艱深；但是帶點矯健潑辣氣息的小品文，卻是雋永有味的。

龔和魏是橫跨在乾隆、嘉慶、道光三朝的人。在嘉慶末葉誕生了曾國藩、咸豐和同治年間是他的全盛時期，他推崇姚鼐，而同時也歎息桐城末流的孱弱，於是就主張以深宏的氣息和駿邁的辭語來輔佐姚氏所立的義法。曾氏位高望重，門下又有許多文士，所以就造成了新的文派——湘鄉派，實際是桐城派的復興。這派的健將是薛福成、張裕釗、黎庶昌、吳汝綸……幾位支配了中國的文壇四五十年，一直到光緒朝的後半期才漸衰落——那期間又有一枝生力軍出現，對歷來仿古的文人做了一回大結算，給現代的新文學運動做了開路先鋒。那就是『今文運動者』的譚嗣同、康

有爲，梁啓超幾位。

中間當然是應以梁氏做代表的。他的文章縱橫酣恣，說理明白，感情豐富；復時時雜以經史子語、佛語、耶教語、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祇求表現的方便，不守一派一系的戒律；雖然有時候排比過多，堆砌過繁，且帶些不必要的緊張語調，近乎金人瑞的缺點，但是痛快淋漓，卻是『瑕不掩瑜』的。他的文章具體地說明了歷來文人摹擬習慣弊病，文學的應向前開闢，不必回頭搜求。中國文人的深固成見，逐漸革除，實爲後來白話文學運動的先導。

敘述了明清兩代的散文的演化之後，我覺得有四點意見：

第一、文學上宗派或風氣的產生，大概有兩個原因，就是一時代的生活，及文人心理的傾向，明清之交的散文多寫忠烈之事，是因爲『易代』之際這種事實很多；梁啓超的文章，以受歐化的日文影響爲原因之一；白話文學的擡頭，以中國文學與西洋文學加密接觸爲主要原因；這些都是時代生活影響文風最顯著的例子。至於文人心理的傾向又分兩點。第一是文人的性格。個人性格很能左右他的作風，歐陽修的紆迴清深的文字，一部分是導源於他從容明察的精神；侯方域的『任

俠尚氣弛跡不羈』的天性，成作『奔放雄悍酷肖其人』的文章。但是更重要而有更大影響的，卻是文人故意推陳出新的動機。歷來文學評論者好像都覺到這一點。曾國藩在他的送周荇農南歸序表說：『六朝隋唐以來，駢偶之文……久王而將厭，宋代諸子乃倡爲韓氏之文，而蘇氏遂稱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勝，物窮則變，理則然也。』這個『變』就由於人心的厭舊喜新。王國維在他的人間詞話裏說：『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之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於此。』梁啟超在他的清代學術概論裏說，一切時代思潮的變遷，都經過『生、住、異、滅』四個階段（『生』是一個思潮掃除舊思潮而代之；『住』是牠的全盛期；『異』是這派中產生支派；『滅』是牠讓位於後來的思潮）而且斷定這一半是由於社會的變遷與環境的需要，一半是由於『豪傑之士』的『欲』『推舊』而『創新』。但最足說明這一點的還要推明朝『後七子』的領袖李攀龍自己的話，他曾有句話表明他們復古的原因，叫做『擬議以成其變化』。換句話說，就是因爲那個時代的散文，都是唐宋八家一派，詩都是宋人一派，所以他們才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這樣說時，文學史上的派別，就是最頑固守舊的，也有可以原諒的方面，就是他們的本意都是爲的『創新』。不過

第二、他們依舊是有過失的。因為他們忽略了兩個重要原則：第一個原則是：文學作品實質面（就是牠所表現的思想感情）的重要，是不下於形式面（就是做表現的工具的文字）。文學作品所表現的思想感情，應當真摯而能代表一個時代的生活；具備這個條件的文學作品，縱使沒有做的技巧，是能獨立不朽的。就明清兩代而論，凡是讀書人，不論有無文學天才，爲求功名起見，都須做文人的；既做了文人，爲要有文章產出，又須做許多應酬倡和之作。因此他們的文章，大都不是應制式或準應制式的作品，就是風花雪月人云亦云的濫調。這樣，就談不到『真摯』和『表現時代生活』。他們既要標新立異，又不能使作品的實質充實，於是就祇有在文字形式上翻花樣了。形式上的技巧當然也很重要；但這時候他們又忽略了第二個原則，就是技巧應當向前開闢，不應當一味向後摹倣。從周秦到元，不絕地有新的文體詩體出現；就是明朝，也嘗在戲劇方面創立了『南劇』；若專講散文，則從周秦到宋也是接連地有新的風調產生。這些事都明白地指陳文章的技巧，是可以向前開創的。但明清兩朝多數散文作家祇知道向古人乞靈。所以他們『由擬議以求變化』的動機，雖可原諒，而他們的認識卻是錯了：一錯於專在形式方面用心；二錯於惟知由摹倣以求新形。

第三、由上面的推究，顯出明清兩朝幾位特立獨行的文人都是可欽佩而且共有一貫的精神。

那就是公安的三袁、金人瑞、袁枚、鄭燮、章學誠、康有爲、梁啓超。他們的主張雖然措辭不同，而根本上卻有一致的認識：就是（一）文章應爲作者內心真實的表現；（二）文章的風格可以開創而不必仿古。第二點和上文所陳的第二條原則相同，第一點雖沒有說到上文第一條裏所說時代生活的表現，而卻認清了作者應有真摯的感情。

他們可說是明清散文史下層的一條芳冽暗流。到了民國年間，就湧出地面，變成現代新文學的一條渾渾大川了。因爲新文學的態度和立場與這一個行列的態度和立場根本上是相同的。現代的文人，我想沒有誰不承認上述的兩條原則；就是新文學運動的發動者胡適氏的『八不主義』——一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二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語爛調；五不重對偶；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語俗字——和他後來用另一方式寫成的四個條件——（一）要有話說方纔說話；（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三）要怎麼說就怎麼說；（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雖然『八不』中的第三項和四條件裏的（二）（三）兩條都應當是有條件的，但就這個主張的全盤立論，大體卻是正當的）——也與上面提出的一個行列一樣，是和上述兩條原則完全符合的。

聽說周××氏也曾有新文學運動是繼承公安派的精神的話。我想他當然不是說這是有意的繼承。因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一種正當的道理，雖然有時候可以因為環境與成見的蒙蔽，不為多數人所了解；但牠或早或遲，是總能被他們認識的。這可認為『真理不滅』的原因之一；而上述兩條原則在中國文學史上之時隱時現，時斷時續，終由暗流變為大川，也就是由於這個道理——就是人性脫離環境與成見的解放，人性的解放是近代文化史的基本精神；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發達、政治上的立憲制度、經濟上的社會主義都莫非是這個精神的表現。文學見解的自由解放史，也就是這種精神的自然流露。

第四、真理的種子永遠在人心裏，不發育，不是由於環境（人類的時代生活）的阻遏，就是由於成見的遮隔。人類的某種演進，往往非待生活達到某個階段之時不能實現。譬如現代的新文藝，不能在中西隔閡的時代產生，就是無數事例之一。所以環境的確有很大的力量；因為牠的阻遏，人類演進，往往是循環的、曲折的、斷續的，往往一件很簡單明白的道理，也得經過幾百年或幾千年之久，才被普遍承認；像上述的文學史上最正當的見解，斷續遲緩的發展，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但我們卻也得承認，祛除成見的精神，就是開創的精神，也有很大的力量。例如唐時『古文』的興起，雖以

八代文的『久王而將厭』爲素因之一，而韓愈的議創卻是最大的發動力。沒有韓愈，則浮靡的八代文大概是要再繼續若干時的。相似地，明朝『前七子』的主張，雖然一方面可算是臺閣體的反動，但七子的非『擬古』則無從『變化』的因襲見解，卻是牠的更重大的原因；否則明朝的散文史，也就不致充滿了那些無謂爭執了。

人心是一個可笑的謎。大多數人的見解是因襲的；他們都不自覺地抱着現在和將來應隨從過去，個人應隨從羣衆的心理；過去祇有很少數人能夠擺脫這種束縛。例如政治生活的演進，當然以世界主義爲最合理而自然，但過去歷史上已演過多少次的分合聚散，但是現代國際政治的演變，仍舊是極矛盾怪謬的。這些事一方面發源於人類的生活狀態，一方面也由於我們的頑固的心理。有人以爲必須經過大屠殺大破壞之後，這個世界才能走上更好的軌道。這是相信環境自然推演力者的說法。但我以爲如果無形地襲故蹈常的人減少，而自由獨立地思想的人增多，則人類的文化演進，是可以更直捷一點的。在國際政治方面如此，在別的許多方面上也是如此。

現在是從明清的散文發展史談到和牠距離很遠的題目了，不得不帶住已經踏上了歧路的馬的繯繩——編者。

選例

『選集』有兩種選法：一是人取大家，文取代表作，聚攏起來，做一本實例的文學史；二是丟開史和人的關係，祇選好文章。

我編這本書，大體上根據第一個標準：選的大都是大家，每一家選了幾篇能代表他的作風的文章；後面還附有他的小傳，並酌加注釋，期易瞭解。

但同時，我也不曾忽略文章的本身價值，就是第二個標準。我是依據下面幾點定去取的：

(一) 能喚起讀者高尚情操，足供人格陶冶的，尤其是能愛護民族的情緒，或『至大至剛』之氣，或與新生活運動的本旨符合的。

(二) 對於文學或別種問題有正當見解的。

(三) 表現方法優美的。

(四) 內容相當地有趣的。